



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

新开放促进改革深化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周振华

中国新的开放战略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外延,拓展深度,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首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变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之一,也是国家竞争的新分

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随之转变为是否可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划分,要成为“成功者”就必须认清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变化。一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亚洲将成为新的利益角逐地和红利集中地。二是传统国际产业分工的“技术—资源—加工”三角关系发生调整。三是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细化和分散化,促进产业内贸易及企业内贸易发展。四是世界经济版图将由跨国公司的区域分布而划分,区域性生产网络和供应链形成,地区性贸易投资协定重要性凸显。五是以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主向以制造业和服务型跨国公司为主转变,服务型跨国公司整合制造业跨国公司,生产基地转变为地区性营运中心。六是所有经济部门的全球化,形成高技能劳动力、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智力服务、艺术创作的全球市场。这些新变化谱写的是全新的全球化,并隐藏着新的全球化

红利,包括全球化红利的变更、再分配、全球供应链分工合作中的红利等等。

其次,通过新开放获取全球化红利。传统开放模式的特点是货物贸易及加工贸易,劳动密集与资源禀赋型制成品出口。问题是出口需求趋于下降,贸易战、货币战背后的资源争夺激化,“挤出”和“竞次”效应强化。因此,我们继续获取全球化新红利必须实行新的开放:即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服务贸易开放;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的开放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的开放。现在要让“壁垒”的墙变薄,不仅是通过多边谈判,更多是通过地区内的内部和跨地区谈判,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开放中需要遵守更高标准的规则,避免在以地区性联盟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投资中被边缘化。

再次,新开放促进深层次体制改革。新的开放主要

目标应是:按照国际惯例和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形成双向互动的开放新格局;重点是服务贸易开放;核心是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过去30年开放制度安排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正面清单;准入前非国民待遇与准入后超国民待遇;降低关税与出口退税的贸易政策。在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不能游离于各种地区性的自贸区之外,不按其标准规则就将受到严重阻碍。新的开放要有新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创新准入制度,制订负面清单,实施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例外管理措施等;完善市场运营制度;以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的综合监管新体制;创新贸易、金融等特殊监管制度。

新开放促进深层次体制改革是意义深远的战略举措,将为中国带来巨大开放红利,也将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推进转型发展

上海讨论对外开放问题要有全球视野和思维,既要瞄准纽约和伦敦来参与全球化竞争,又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上海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应扮演三个角色: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引领者;二是金融业开放的领跑者;三是长三角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为此,上海应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服务领域。

首先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目前,上海服务业发展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当前上海服务业比重虽然已经达到60%,但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研发设计等具有创新特征的专业服务并没有明显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制造业的支撑。另一个是各种优质资源和要素在上海集聚,但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创新动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一鸣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管理上看,是用发展制造业的管理制度来发展服务业;从市场体系看,要素市场改革不适应现代服务业市场要求。

因此,上海应加快现代服务业开放。一是以服务产品的创意化、服务流程的标准化、服务产业的高科技化和服务过程的高质化等服务创新抢占服务业发展高地;二是加速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向以网络和信息技、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技术服务业转换,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三是针对上海现代服务业与长三角制造业的共生关系,提出一个系统化的整合思路,大力推动跨地区服务业发展,通过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促进上海与长三角形成多个全链条、全流程的现代服务业共生体,增强上海现代服务业与长三角制造业的共生融合;四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好地发挥风险投资、创业板和私募股权投资等金融工具对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健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培育和发展高端要素市场。同时,积极鼓励和扶持本地的制造业企业与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结合,由制造向创意、设计、研发、

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 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 隆国强

在过去30多年内,每10年都会有一些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建立了经济特区,同时也拉开了改革的大幕;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跨了非常大的一步;今天,我们又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期待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战略性部署。而国务院原则批准的上海自贸区方案能否成为又一个10年重大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呢?

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确定上海自贸区的目标定位。为什么叫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不是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觉得这是着眼于全国的发展,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和开放。它有两个基本的定位:一是先行先试,要面对变化的世界,变化的比较优势和国内的形势,为中国下一步的开放、改革做很多试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二是要争创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大调整、大转型来形容变化的外部环境,我觉得非常到位。前30年我们实现了一个跨越,就是靠出口资源性产品转向了靠出口低成本

管制过严。

上海自贸试验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总体来看是通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来支撑上海打造国际贸易中心。有人说叫一线放宽,二线管住。实际上,便利化是一个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的变化,即先放行,后查验。另外,服务贸易领域更多的是自由化,就是怎么能够更加开放。为此,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建议要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我们怎样在这个试验区里面打造出一套适合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国际化运营体制机制。最后,新机制归根到底是政府的定位,是转变政府职能。上海市有一个非常有为也强有力的政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高效率的政府,对上海来说,下一

上海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社会政策创新问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郑秉文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即制度、要素、效率和创新驱动。2012年上海进入高收入行列,到了“创新驱动”的历史阶段。“创新驱动”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高收入阶段,软实力常常比硬实力更重要,软实力经常创造出硬实力。所以,“制度创新”应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制度创新”,包括“经济管理制度”,还包括“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将是未来上海可持续发展 and 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

撑,是上海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社会保证。社会保障在上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上海应在社会保障的财务可持续性上进行制度整合与制度创新。

第一,坚持统一制度,提高财务可持续性。上海几年前打通综保、镇保、城保三个制度之间的通道,统一制度,无疑是明智之举,对提高财务可持续性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提高农民工参保比例,稀释赡养比。截至2012年末,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参保比例是34%,比全国17%正好高出一倍,这是一举两得,既保护了外来人口比例,同时又稀释了赡养率,提高了制度收入和支付能力,上海在这方面还应不断提高。

第三,投资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扩大投资渠道,提高收益率。

第四,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保体系。实现基本制度、企业年金、延税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三条腿”的平衡,建立市场化的养老金体系,维护中产阶级的经济和金融生态环境。

新时期上海经济国际化重点和方向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一、上海经济国际化重点和方向

上海在未来30年应实现新需求结构诱导新供给结构转型: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与广深港为龙头的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上海能否率先发展成为纽约、伦敦级别的,有能力引领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世界领袖城市;能否集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质的资源、最有影响力的市场和企业,能否在价格的决定权、规则的制定权、责任的担当权及逆周期的调节能力上超越新加坡、香港这样的亚太自由港城市;能否在影响力上超越东京、首尔这样的制造业支撑国际都市;能否率先培

育新需求结构并带动新供给结构转型,带动知识型、创新型、智力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中等收入人群倍增,优先开发高增值阶层,加快国际化,“引进来”、“走出去”,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和服务中心。

二、上海应当率先探索高标准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高标准开放:高标准的商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国际化、自由化和便利化;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高标准的服务业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为国内、亚太高增值服务提供者。

高标准改革:推动竞争中性和改革,打破各种垄断和不合理的干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范接轨的,公平、规范、透明的现代治理体制和法治体系;推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政府担当增强维护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的责任和执行能力;推动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业政策;金融、财税、要素和衍生品市场改革。

高标准发展:率先实现包容性、平衡性、可持续发展。降低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政府服务供应链和人才供应链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提升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互联互通效率;率先带动东部与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制度和发展合作,率先推动向西开放。